本版编辑：史小今
E-mail：m2@studytimes.cn
Tel：010—62804757

世界经济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核心与挑战

中美应借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之机，以开放促改革，深化供给侧改革夯实产业竞争力，促进资本等要素通过投资优化资源配置，为全面开放打好基础，实现中美两国国际投资深化合作的目标。

□ 陈建奇

今年6月6日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上讲话指出，中美当前要着力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同有关各方一道推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取得积极成果，全力争取早日达成互利共赢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根据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成果，中美双方将加快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以期达成一个能有效促进并确保市场准入和运营的互利共赢的高水平协定。既突出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互利共赢特征，也预示该谈判进入了加速期。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于2008年6月启动，迄今已进行了25轮谈判。截至目前，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已历时八年多，凸显其复杂性与艰巨性。

互利共赢是谈判的基石

中美虽然互为贸易大国，但投资合作却相对滞后。2015年中美贸易额达5600亿美元左右，美国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已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与此同时，截至2015年底，美国对华投资累计774.7亿美元，中国在美累计直接投资466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第六大外资来源地，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四大目的地。中美贸易联系相比投资合作更加紧密，预示未来投资合作空间较大的事实，构成中美推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直接动因。

伴随着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中国市场对全球的意义日益突出。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未来将对中国市场更加重视，美国跨国企业期待加大对中国投资的诉求越来越强烈。在此情况下，美国希望通过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促使中国能够更大程度开放市场。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包括苹果公司、波音公司、可口可乐公司等94位美国公司首席执行官联名致函中美两国领导人，希望中美双方能迅速达成一个高标准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从这个角度看，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协定谈判符合美国的利益诉求。

从中国来看，中国海外投资进入高速增长期，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有助于为中国海外投资营造稳定的环境。未来15年左右中国海外投资存量占GDP比重将上升至20%左右，据此测算，未来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将增加3.5万亿美元左右，中国将超越美国而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第一大国。因而推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不仅有助于增大中国对美国投资，而且也有助于中国以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为样本同其他国家签订互利共赢的投资协定。

从全球经济来看，中美投资协定谈判有助于深化中美两国经贸合作，促进双方国际投资的深化合作，提高中美两国投资体制的透明度和一致性，加强跨境投资流动，同时创造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为双边经贸关系注入新的增长动力。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间积极稳定的经贸投资关系，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增长，中美投资协定的谈判也有助于全球范围内的国际投资协定的升级扩围，深化世界各国投资合作，助推全球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培育。

谈判核心：负面清单

虽然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是互利共赢之举，但涉及两国产业竞争力及国家安全等敏感内容，而且两国经济发展阶段及产业结构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在投资协定谈判时中美两国所面临的挑战及具体诉求并不完全一样，促使双方需要进行多轮深入磋商，甚至在某些关键领域需要讨价还价。从近年来谈判的焦点来看，负面清单是双方最为关心的内容。

虽然历史上美国已经达成的双边投资协定中，较少直接使用负面清单这个词，用得较多的是“不符措施”，但这些“不符措施”汇总之后的内容与负面清单的内容颇为接近，表明美国较早就采用了负面清单管理的思想。而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大多采用的是正面清单，暴露了中国在负面清单管理方面的经验相对不足的问题。2013年以来中国成立了上海自贸园区，此后成立了天津、广东、福建等自贸园区，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探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2015年中美双方首次交换负面清单时，中国提交的负面清单太长成为谈判的焦点问题，美国认为中国必须采用更加简洁的负面清单。

虽然中国负面清单较长的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但当前已经实现了概念上从正面清单向负面清单的转换，这已经是巨大的进步，而且中国尚属于发展中国家，产业保护诉求相比美国会更强，这些决定了中国负面清单难以同美国完全匹配。从目前的谈判信息来看，美国较为关心的是互联网、电信、金融、文化等领域的开放，美国迫切希望看到一个尽可能短的负面清单。但网络信息安全及金融波动加剧的风险等因素可能促使中国在上述领域秉承保守态度，负面清单的大幅度缩减也就比较困难。

谈判进入加速期

中美双方关于负面清单的分歧构成了谈判的难点和重点，八年多的谈判引发社会对于协定久拖不决的担忧。当前加快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已经写入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成果，未来中美双方将把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作为更为重要的议题来抓。更为重要的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属于奥巴马任内希望完成的重要工作，这都预示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更加迫切，由此可能倒逼谈判更加务实高效。

然而，结合目前的情况看，美国较难大幅降低负面清单标准，因为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必须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参议员通过才能生效。如果中国未能实质性地缩减负面清单，那么参议院可能较难顺利通过。中国如何进一步缩减负面清单的问题就更加突出。

当然中国也对美国负面清单有着重要的诉求，美国虽然在负面清单中列举了关键基础设施、重要技术、国家安全等项目，但并没有详细的界定，而且当前仍然经常出现美国针对华为等中国企业投资非常规审查的现象，美国当前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于保障中国在美投资构建稳定环境的作用仍然备受质疑。而且未来中国国有企业在美国投资的需求将不断增强，如何看待国有企业在美国投资也成为美国负面清单的重要内容。

总体来看，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面临的挑战不容低估，但包括投资在内的诸多合作持续深化是大势所趋。中美建交30多年来中美经贸合作不断深化预示中美合作不会逆转，中美通过经贸合作所滋生的共同利益将持续加深。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属于互利共赢之举，谈判的结果不是一方向另一方妥协，而是共同推动双边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从这一点看，中美应借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之机，以开放促改革，深化供给侧改革夯实产业竞争力，促进资本等要素通过投资优化资源配置，为全面开放打好基础，实现中美两国国际投资深化合作的目标。

欧洲难民潮带来的思考

在可预见的未来，权力基础的提供者依然是主权国家，区域制度也好，全球制度也好，都不能忘记权利与权力是不可分离的，人权最有力的保护者是公民所属的主权国家，轻易以武力干涉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必须准备承受相应的代价。

□ 贾烈英

2015年，欧洲面临着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潮，从中东和北非涌向欧洲的难民约有150万人。阿拉伯世界一向被视为欧洲的“后院”，也是本次难民潮主要的发源地，这次难民潮给欧盟带来了诸多挑战，值得认真思考。

难民潮挑战欧盟价值观

面对这次二战以来最大难民潮的冲击，欧盟成员国的态度不尽相同。大国之间不一致，共同的司法内务政策受到考验，欧盟的道德与制度优越感也受到质疑，欧洲的政治秩序遭遇了一场空前危机。

首先，德国的政治影响力进一步加大。法德是欧盟一体化的发动机，两国在重大问题上总是尽量相互协调和配合。但是由于法国遭受恐怖主义袭击，况且人口中穆斯林比例已经超过了10%，所以政府对于接纳更多中东难民很谨慎。

其次，欧盟共同的难民政策受到挑战。欧盟的难民政策经历了一个各国各自为政到相互合作与协调，再逐步统一至欧盟框架之下的过程，并最终逐步形成共同的难民政策。但是统一的难民政策却难以顺利落实。大国任性改变态度，小国更以国力不足拒不执行。面对欧盟战略上的软弱无力，人们不禁会问，欧盟还能存在多久？欧盟引以为傲的“欧洲各大共同体、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刑事领域警务与司法合作”，这三大支柱都不足以处理家门口的问题，欧盟在世界政治中的发言权必将大打折扣。

再次，难民潮也使欧盟宣扬的普世价值观陷入困境。多年来，欧洲一直是很多政治、经济、社会规范的诞生地与输出地，比如主权、市场经济、国际法、人权、民主等，欧洲也为自己的规范性权力感到自豪甚至到了傲慢的程度。而对其输出的战争，殖民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多领域的危机，干涉主义灾难等却避而不谈。这次欧洲家门口的难民潮使欧洲左右为难，挑战直指欧盟深层次的普世价值观。

难民潮呼唤全球治理

当前，难民潮主要冲击的是欧盟的大门，却需要世界的通力合作来解决。随着交通手段、信息技术的助力，跨境问题日益突出。除了国家间的双边合作外，区域合作、全球合作都是必不可少的。

要想彻底解决难民潮，必须重新对世界秩序进行深刻反思。欧盟2011年以来的对阿战略出现了大的偏差，偏离了原先宣称的欧洲睦邻政策和地中海联盟战略。汹涌的难民潮已经证明了武力输出民主、民主和平论、大中东民主化的失败。当前冲击欧盟的难民有80%来自叙利亚，叙利亚安定了，难民的人数就会大大减少。在叙利亚问题上，中俄一直力主政治解决，在联合国多次行使否决权，防止了保护的责任的滥用和新干涉主义的冲动。欧美目前不能再以巴沙尔下台为前提解决叙利亚问题，叙利亚的道路应该由叙利亚人民自己选择。

进一步完善欧盟内部的难民治理机制。世人对欧盟在本次难民潮当中的做法评价不一，欧盟的难民工作还有很多提升的空间。例如：制定欧盟统一的对待难民标准；以难民基金为杠杆奖惩接纳、有限接纳或拒绝安置难民的成员国，让成员国感到安置难民有利可图，而非完全是负担；欧盟国家间协调依然存在较大问题，各国未能公平分配接受难民的任务；在南欧国家或更广成员国范围内号召挖掘可利用的地域资源；加强难民救助体系的国际合作，或加强难民海上救助，或在中东地区建立更多难民救助中心。

发挥以联合国体系为代表的国际社会作用。半个世纪以来，联合国为解决世界难民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因为其杰出的工作，1954年和1981年诺贝尔委员会两次把和平奖授予了联合国难民署。但是，现在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全球治理体系仍然非常脆弱，以至于出现了反恐越反越恐、国家合作越来越趋流散、全球问题得不到有效治理等问题。其实，冷战后的世界出现了许多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跨越国界、超越国别，对整个人类形成威胁，许多非传统威胁都属于这一范畴，任何单一国家都无力独自解决这些威胁。这种态势原本可以形成更加有效的合作平台，但事实上解决全球问题的合作平台并没有形成。未来应该更加重视发挥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作用。



把握好主权与人权关系

欧盟是国际关系中的主体，难民也是国际关系中的主体，它们之间依赖于对世界政治本质的看法。有人认为世界政治本质上是权力政治，有人认为本质上是权利政治，实际上二者的结合才是它的全部，欧盟对阿拉伯世界战略的基础依然是主权和人权的关系问题。

欧盟是欧洲区域主权国家合作的实验。其设计是通过低级政治走向高级政治的路径，减弱单个国家的主权，建立超国家机构，扩大和加深国家间合作，从而为改善欧盟区域内的和平、发展和人权作出贡献。但是它的组成单位是国家，而不是个人，所以欧盟的权力与成员国的权力、欧盟的权利与欧盟公民的权利有一种张力。

同理，欧盟成员国的主权与中东国家的主权有张力，也就是有权力冲突，当欧盟国家依仗自己的权力，摧毁中东国家的主权边界时，难民问题产生了，而当前的欧盟不足以给这些难民提供权利保护，无论是理念上的，还是实践上的，但中东的难民不能忍受在本国失去权利的生活，而对欧盟国家将给与的权利产生了幻想，这便产生了一幕幕的悲剧，难酬蹈海，在所不惜。

由2015年的难民潮可以看出，欧盟一体化的步子不可能太快，国际法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权利本位虽然是世界政治的发展趋势，但是权力支撑是必不可少的，而在可预见的未来，权力基础的提供者依然是主权国家，区域制度也好，全球制度也好，都不能忘记权利与权力是不可分离的，人权最有力的保护者是公民所属的主权国家，轻易以武力干涉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必须准备承受相应的代价。

热点透析

美越军事合作的战略考量及其局限

□ 慕小明

越共刚产生新一届领导集体，美国总统奥巴马即正式访问越南。到访的第一天，奥巴马送上世人略感震惊的“见面大礼”，宣布全面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作为曾经你死我活的“宿敌”，近年来美越两国关系渐行渐近。政治上，美越领导人摒弃越战前嫌，实现互访；军事上，美越两军频频交往，解除武器禁运的同时，两国在金兰湾使用问题上亦态度暧昧；经济上，越南成为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成员中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当前中美南海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奥巴马此行可谓耐人寻味。

历史回顾

1995年克林顿政府与越南正式建交，为两国军事关系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2000年3月，美防长科恩访越。2000年11月，克林顿成为越战后首位访越的美国总统，这两次“破冰之旅”拉开了两国军事合作的帷幕。此后，美越军事合作领域和交流水平稳步提升。2002年，越南首次作为军事观察员参加美泰新“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2003年11月，范文茶成为越战后首位访美的越南防长，其间与拉姆斯菲尔德就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历史遗留问题以及租用金兰湾等进行深入交流。同年11月19日美海军第七舰队“范德格里夫特”号导弹驱逐舰驶入胡志明港，成为越战后第一艘访越美舰。2006年6月初美防长拉姆斯菲尔德访越，开启了美越军事合作新阶段。2006至2010年，两国高层和舰艇访问更加频繁。

随着奥巴马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越南在美地区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2010年希拉里访越，称有兴趣与越发展“战略伙伴”关系，明确表示美国高度重视越南在南海的“战略利益”。2012年，美防长帕内塔高调访越并考察金兰湾基地，显示美越军事关系进一步深化。随着南海局势升温，从2010年起，美第七舰队访越并开展“非作战性”联合演习已成常态化。特别是2014年我国“981”海上钻井平台事件期间，美海军访越频次和数量更是激增。2014年8月13日至16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登普西访越。这是美国参联会主席在越战后首次访越。美越双方还在核技术、核安全、核存储等领域开展了合作。2015年6月1日，越国防部长冯光青与美国防部长卡特会晤并签署了《国防关系联合愿景声明》。

战略考量及其局限

美越关系中，越南看重美国的大国地位和实力，美国则看重越南的重要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美国和越南的走近，源于共同的战略认知和判断。对于美国而言，美越关系的走近，首先源于越南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提升。自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先后巩固和强化了美韩、美日、美澳军事同盟，积极拉拢菲律宾、印度等国，此番美国极力拉拢越南，意在获取亚太战略支点，整合亚太战略体系。美国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意在提升越南的军事实力，强化对中国的海上遏制。其次拉拢越南也是遏制和挤压俄罗斯的战略举措。越南近5年武器进口总额同比增长699%，其中约90%的军事装备都来自俄罗斯。美国解除对越武器禁运，意在打压俄罗斯在越南武器市场的主导地位，防止俄罗斯重返金兰湾。对于越南来说，受其自身实力和国际地位的限制，则希望能够游刃于大国之间，推行其“大国再平衡”战略，借助美国在中美俄之间形成战略平衡，谋求经济和军事收益的最大化，提升其在东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纵观20年来的美越军事合作，美国始终掌握主导权，而越南则从质疑猜忌、谨慎应对到积极交流，一直显得比较被动。由于意识形态和历史原因，越南对美国的“渗透”和“颠覆”等和平演变手段一直存有戒心。可以预计，未来美越只会在“伙伴”关系的框架下开展合作，很难真正走向“结盟”。不过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与越南“大国再平衡”战略存在利益契合点，未来美越将会持续加强在经济、政治和防务安全多边机制等领域的合作，而且不排除美越在南海问题上更加频繁和实质化的合作。

美越军事合作升温，绝非越南“长袖善舞”和自身强大，只不过是国际大势使然。从根本上讲，越南同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并不具备共同的国家战略利益基础。相反，积极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共谋中越经济合作发展，防止成为美国遏制中俄的马前卒，才是越南最现实的选择。

战略视角



▶2015年5月31日，美国防长卡特登上曾与中国冲突的越南船。